清史纂修

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忆王思治的清史研究

刘凤云

王思治（1929—2012）是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以有生之年对清前期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相关制度的系列研究，为中国的清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借鉴前辈治学经验的角度看，不啻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早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还是青年学生的王思治便参与了中国史学界有关“五朵金花”的理论大讨论。期间他撰写了多篇相关的研究论文，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王思治从对奴隶劳动的社会影响、中国奴隶社会解体的基本途径等问题入手，深入分析并阐述了两汉奴隶制大量存在的史实，并将其置于理论层面上加以探讨，以证魏晋封建说。其中，多有与史学前辈翦伯赞的讨论，展现出他在史学方面的探索精神与勇于思辨的理论天赋。

进入 70 年代以后，王思治将研究重点转向清史，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有关清朝历史地位、清初社会矛盾、明清战争、国家统一问题、皇位继承制度、历史人物评价、清前期中俄关系、承德避暑山庄、乾隆朝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两淮盐商的盛衰、宗族制度等论题上，多有精辟的论述，其鲜明的思辨性及寓议论于宏大叙事中的风格，使其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引人入胜的思想性。这里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清前期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是对清史研究的基本定位和定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运行轨迹及走向等问题的认识与评价。

80 年代，清史研究从诸多禁锢中获得解放，并围绕明清鼎革问题，形成以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八旗制度、明清战争、清军入关与清初的社会矛盾、清廷的统治政策等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但对清朝历史地位持否定态度者仍大有人在。为此，许多学者提出应重新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正是在这场讨论中，王思治撰写了《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①]一文，强调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趋势来观察明清之际的历史。他提出这样几个论点：其一，明清之际不存在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即清朝的建立不存在阻碍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其二，能否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从而担负起抵御外国殖民势力入侵的历史使命，应该是评价明清两朝历史地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其三，清政府在统一喀尔喀蒙古、天山南北、西藏的过程中，将一系列对领土行政有效管辖的制度推行到这些地区，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体制上得到确立并巩固；其四，清前期社会经济方面最突出业绩之一，就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积极开发，其成就超越了

［收稿日期］2014－02－20
［作者简介］刘凤云（1952—），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liufengyun3622@ ruc. edu. cn

① 参见王思治：《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史研究集》第 1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年，第 31—60 页。

历代，使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

在上述观点中，王思治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仍然是对清前期历史地位评价要放眼世界。1985年，他与李鸿彬合作发表文章，直接以《明清之际的历史必须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命名，再次强调说，尽管明清之际早期资本殖民势力还没有力量占领中国，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现实的存在，然而，殖民势力既然已经到来，他们就一定会接踵而至。因此，清军入关，重建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的历史大局看，是应予肯定的。①

王思治对清前期历史地位的论证，即从清王朝结束国家战争分裂局面，加强国家统一，以及对抵御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的入侵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来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不但视野开阔，观点新鲜，且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对以往否定清朝历史地位的认识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并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理论上探索的空间。就此后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王思治的上述认识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

第二，对清朝完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诠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辽阔疆域的奠定，是王思治对清史研究的又一着力点。他以宏观叙事的手法，系统阐述了清朝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文章中，王思治将国家统一和多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辨析植入复杂多变的战争场景中，在《论皇太极时期对明作战策略的演变》、《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等文中，系统考察了清朝如何在明末多种政治与军事力量的角逐中夺取最终胜利的进程及诸种成因。就清朝在逐鹿中原中的战略决策及其调整、战争的性质，以及清初社会矛盾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勾画出一条清晰的历史主线。并通过史实的阐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事变是历史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等理论。

此外，王思治对清朝绥抚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以及用兵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政治军事行动进行了研究，其论点多集中在《十七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② 一文。在这篇叙史长文中，王思治明确指出这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大战，牵动着漠南蒙古、天山南北、青海、西藏，影响之大且深远。由于噶尔丹与沙皇俄国相勾结，清政府的平准也就具有了抵御外来势力的内涵。认为，平准战争成为弘扬现实爱国主义的最直观的心理动源，虽然它与清朝的专制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更多的积极意义却又体现在辽阔疆域的确立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

在民族关系的论述上，王思治多次使用了“国家统一”的概念，可以说他的核心理论是出自对儒家“大一统”的诠释。“大一统”意味着国家拥有广阔无垠的疆域，混一天下的恢宏气象，以及凝聚于此的多民族一体。王思治正是在对清朝统治者这一政治诉求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对清朝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进行阐述的。

第三，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人物的研究，历史上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因此人物研究中的评价标准历来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王思治参与了史学界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他主张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双重角度关注清官，其观点曾引起前辈学者吴晗的关注。自70年代，王思治负责主编《清代人物传稿》的工作，并就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王思治提出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评价应该是见仁见智。指出，“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历史的大局来看，是应予肯定的，这也就是评定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他同时强调，“不能因为肯定清的统一，对降清者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肯定；反之，凡抗清者一律否定。”抗清斗争中所包含的“爱

---

① 王思治、李鸿彬：《明清之际的历史必须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② 王思治、吕元骢：《十七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国”之举当然是不应否定的。反复无常而无一定信念者不在此列，为求高官荣禄而降清者也不应肯定。[①] 他认为，古人强调有三类人可以不朽，即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他以多尔衮和史可法为例，说明二人虽为敌对阵营，却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地位，多尔衮以为完成国家统一立功而载入史册，史可法血战不屈，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以立德名垂青史。这种评价，注重了历史的“客观性”，不再给历史人物贴上英雄、忠臣、叛徒、汉奸等标签，纠正了以往历史人物评价上的片面性。

其次是明确提出有关“贰臣”的评价，不能以古人为法。王思治指出，清初统治者以“顺逆”判人，但到了乾隆中叶以后，抗清者竟作为忠功典范大加褒崇，降清者反而是大节有亏，国史馆奉诏将降清者编入《贰臣传》。毫无疑问，乾隆帝的用意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儒家“忠君”的思想，以进一步确立君权至上的绝对权威。所以，王思治强调，“贰臣”是一个代表传统社会正统思想的观念，“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清统治者的标准之不足为训。”[②]

王思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将其置于历史的大环境中，通过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社会影响进行考察的，仍然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大视野。

第四，从国家政治到宗族社会。王思治除了注重对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力斗争等话题的解构外，也注意到了围绕权力形成的利益集团等问题，以敏锐的史感，细致的分析，宏篇叙史的手法，回答了清前期的权力如何被统治者所演绎？制度的改变又是如何为权力者服务？其间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又是如何通过制度划分权力，以及权力结构的状态及相关利益集团等问题。而他选择的研究对象则是属于皇权政治的皇位继承问题，并于 1996 年发表《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③]。这是清史学界第一篇系统深入分析清代皇位继承制度演变过程的学术专论。他从中国古代政治发展规律的角度，将清初皇位争夺置于满洲贵族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进行考察，对其背后满洲贵族集团之间的利益角逐与残酷斗争进行了阐述，并解读了围绕皇权及皇位继承斗争中产生的诸多疑案、谜案，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及其真实性给予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在关注国家政治的同时，王思治还将研究伸入社会的基层，他的《宗族制度浅论》[④] 一文，比较全面地阐述和讨论了中国宗族制度的历史变迁、清代宗族制度的发展轨迹、族权的构成和社会功能、族权和封建政权的关系、宗族内部的阶级关系。特别是，王思治在文中通过对江西、福建等地宗族的考察指出，强宗大族与封建政权是存着一定矛盾的，“宗族组织有时也成为农民斗争的手段。”并认为“阐明宗族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是揭示我国封建制度历史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王思治的这篇学术论文虽然已发表十余年，但在学界依然倍受重视，并被译为日文，收入《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特质》一书（和田正店编，日本中国书店版），作为日本大学的教学参考书。

半个世纪以来，王思治孜孜治学，以高屋建瓴的理性思维、严谨平实的独到见解，在学术的道路上笔耕不辍，即便是 80 有余的高龄，依然爬梳于浩瀚的文献之中，在清史工程的纂修中燃烧着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节蜡烛。他一生笃诚，朴实无华，常以“老书生”自诩，他对学术的挚爱融于字里行间，学术研究已融入其生命，成为其生活中的一部分。他曾说：“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因此，也必须从历史上去认识自己，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⑤]这句话集中表达了他的史学情怀。

---

① 参见王思治：《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3 年第 4 期。

② 参见王思治：《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3 年第 4 期。

③ 王思治：《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满学研究》第 3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第 1—84 页。

④ 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丛》第 4 辑，见《王思治自选集》，第 545 页。

⑤ 王思治、吕元骢：《康乾“盛世”简论》，《满学研究》第 5 辑，民族出版社，2000 年。